

20 世纪坦桑尼亚

圣经解读与政治互动

刘 宇

内容提要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伴随着西方殖民活动传播到坦桑尼亚。基督教在坦桑尼亚人民的生活、文化、政治建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圣经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殖民者和反抗者都从圣经中寻找契合需求的章节，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殖民者意在借助圣经维护殖民统治，反抗者则是“利用主人的工具拆毁主人的房子”，借助圣经推翻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与尊严。20 世纪坦桑尼亚圣经解读经历了三个阶段——阅读阐释（Soma）、精神体认（Roho）和乌贾马（Ujamaa）解读。通过对坦桑尼亚圣经解读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坦桑尼亚圣经解读的阶段性发展及其与政治互动不仅满足了国内各部族人民现实中和心理上的需要，发挥了很大的感召团结作用，也为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增进民族一体化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坦桑尼亚 圣经解读 殖民主义 乌贾马运动

作者简介 刘宇，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州 51000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东非最大的国家，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worldometers）显示，该国人口约 5783 万人，分属 4 大种族和 127 个部族。坦桑尼亚各部族传统上信奉原始宗教，但是随着历史变迁，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基督教逐渐在坦桑尼亚传播开来，形成与当地各种宗教共存的局面。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4 年发布的调研报告，坦桑尼亚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原始宗教的人口比例分别约为 61.4%、35.2% 和 1.8%。^①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坦桑尼亚历史的关注多集中于政治史、教育史，其中以乌贾马（Ujamaa）政治理念研究最盛。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出发，厘清坦桑尼亚的圣经解读史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① “Global Religious Diversity”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2014 p. 22.

有助于加深对坦桑尼亚宗教史和政教关系的认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笔者尝试梳理 20 世纪坦桑尼亚圣经解读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借此管窥宗教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这个非洲国家。

圣经之阅读阐释

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和外来宗教传入前，坦桑尼亚人在部落酋长、祭司、预言家、巫师和巫医的引导下遵循本土文化、当地习俗和原始宗教传统。坦桑尼亚与欧洲的接触始于 19 世纪中期，先后经历德国与英国的殖民统治。圣经既被殖民者当作入侵征服和统治压迫的习惯性工具，也成为被殖民者抵抗外来侵略、摆脱殖民统治的创造性武器。

(一) “读者”与圣经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德、英等西方国家相继侵入东非。1886 年德国将坦噶尼喀纳入德属东非领地。在此之前，英国圣公会已率先在坦桑尼亚开展传教工作，1876 年 8 月在姆普瓦普瓦 (Mpwapa) 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传教站。20 世纪初坦桑尼亚人民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马及马及起义前后，英国圣公会的传教活动取得很大进展。^① 彼时，圣经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文本，也成为一个文化和殖民的复杂符号，进入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为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和压迫提供了“合法”通行证。

基督教传入初期，除了传福音这一中心任务外，传教士还在全国各地开办学校，别有用心地选择适合的篇章和角度，利用圣经为其殖民活动提供道德和宗教支持。随着时间推移，传教士们进而意识到，若能让教徒使用本土语言阅读圣经，有利于消减因为语言晦涩和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理解困难，同时将西方的意识形态更为自然地强加给被殖民者。于是，他们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便于坦桑尼亚人参加传教站的阅读班。那些能够阅读圣经的人则被称为“读者” (wasomi)^②，而这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基督教也就成为“阅读基督教” (Soma

① W. B. And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East Africa*, Dodoma: Central Tanganyika Press, 1981, pp. 1-15.

② “读者”这一名词在本文中加以引号，因为它具有双重意蕴：一些识字的读者，具有“阅读” (soma) 圣经的能力；另一些文盲读者，他们需要凭借他人口述和记忆去“阅读”圣经，他们以此去“听、复述和对圣经进行个人理解”。see G. O. West *The Academy of the Poor: Towards a Dialogical Reading of the Bible*, Pietermaritzburg: Cluster Publications 2003, p. 10.

Christianity) ①。其历史进步性在于：一是坦桑尼亚人能够使用母语阅读圣经；二是打破了圣经阐释由传教士独揽的局面，使得“以独立的方式进行解读，找寻引领他们进行社会、政治斗争的力量”成为可能。②

缘何传教士解读圣经的垄断权被废除，预示了权力反转的机遇？这是因为“读者”们一旦有任何对信仰或现实的质疑，便可以绕过传教士，直接依据圣经进行解毒与判断。当地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对于自主阅读圣经的需求，反映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重获自尊自信的渴望。“圣经在复兴遭受殖民主义侵蚀的当地文化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无论是西方文化优越论还是殖民扩张“有理说”，这类最初由殖民者作出的圣经诠释里暗潜的企图也被“读者”细察并揭露。“昔日占话语主导地位的传教士对当地人阅读圣经方式的影响力日渐式微。”④ 其实，自圣经传入坦桑尼亚，当地人民便在学习和理解过程中不断深入反思，揭示传教士解经布道与殖民扩张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复杂而能动的过程被坦桑尼亚的圣经“读者”视为消解西方殖民者圣经解读垄断地位、重获发言权和独立自主的必由之路。

当然，德国殖民政府也察觉到反抗精神萌发的危险性。从历史材料可知，德国殖民者总用警戒的目光看待坦桑尼亚的“读者”。他们认为，“这些基督徒学会了阅读，进而就会用日光镜之类（他们之前对此还一无所知）的工具传递情报。”⑤ 的确，自坦噶尼喀 1886 年沦为德国殖民地起，“读者”就心怀这样的期冀——等待时机成熟，当他们掌握了阅读能力，就会运用圣经的力量，带着新知识和技能积极拯救自己，夺回公正与发言权。

坦桑尼亚人民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开展了连续不断的英勇斗争，规模较大的有布希里起义（1888—1890）、赫赫族起义（1890—1898）和马及马及起义

① A. O. Mojola *God Speaks in Our Own Languages: Over 150 Years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Kenya, Tanzania and Uganda* , Nairobi: Bible Societies of Kenya ,Tanzania and Uganda ,1999 p. 80.

② G. O. West *The Academy of the Poor: Towards a Dialogical Reading of the Bible* ,UNKNO ,1998 , p. 10.

③ Lamin Sanneh, “Gospel and Culture: Ramifying Effects of Scripture Translation” ,in Philip C. Stine ed. *Bible Translation and the Spread of the Church: The Last 200 Years* ,Leiden: Brill , 1922 p. 1.

④ Thomas Spear, “Toward a History of African Christianity” ,in Thomas Spear & Isaria N. Kimambo (eds.) *East African Expressions of Christianity* ,Oxford/Dae es Salaam: James Currey/Mkuki na Nyota ,1999 ,p. 6; K. Bediako ,*Jesus in Africa: The Christian Gospel in African History and Experience* ,Akropong – Akuapem: Regnum Africa 2000 pp. 57 – 58.

⑤ 日光镜是一种日光信号反射器，工作原理是利用信号器上的准星对准受信方，通过转动镜面或遮挡光线按照摩斯密码发送闪光信号，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see Elisabeth Knox *Signal on the Mountain: The Gospel in Africa's Upland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 Canberra: Acorn Press ,1991 p. 206.

(1905—190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桑尼亚的圣经“读者”巧妙地将他们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推翻德国殖民统治的战斗中去。他们当中有些人能在山区把军事情报传送出去。某些普通“读者”，譬如丹耶利·姆博戈（Danyeli Mbogo），战争期间就曾因“发送军事情报”被德军定罪。一些当地首领曾在一战期间积极协助盟军，向他们提供本地武装力量。例如，著名的部落首领马赞戈·查鲁拉（Mazengo Chalula）也是一名圣经“读者”。据记载，有一次马赞戈为了逃避追捕藏身于一处灌木丛，周边的村民团结一致，对德军假称其已经被狮子吃掉。^①为了表彰马赞戈的英勇，英国政府在1924年授予其“坦桑尼亚最佳政治领袖”和“坚定的英国圣公会庇护者”两枚荣誉勋章。^②

其实，除了马赞戈，还有不少类似的圣经“读者”成为政治领导人，他们善于用圣经知识团结和动员民众。根据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保罗·怀特（Paul White）所述，“坦桑尼亚的首领坦言，圣经在政治生活中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领导众人，故而经常运用圣经已成为一种习惯。”^③

（二）教育与解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其海外殖民地被协约国集团瓜分，英国占领德属东非全境，从1920年开始对坦桑尼亚进行殖民统治。政治上，英国殖民当局自1925年起引入“间接统治法”，将坦桑尼亚划分为11个省，每个省下辖若干县，基层政权恢复当地酋长和部族制度，承担起维护秩序和社会管理职能。教育上，殖民当局大力推行殖民教育，鼓励教会开办学校，初衷是提高教徒的识字和诵读水平，理解圣经的内容，领会上帝的神圣精神，为殖民统治服务。根据间接统治法，殖民政府赋予当地首领部分自治权，并逐步以当地受教育者取代之前的德籍或阿拉伯籍官员。这些受过教育的本地领导人大部分是圣经“读者”，这种任命圣经“读者”为地方领导人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坦桑尼亚独立，可见圣经对坦桑尼亚政治影响力之大。

在坦桑尼亚独立运动中，人们积极投身解放斗争，圣经的作用亦可追溯到对这些斗士的教育和启发。事实上，基督教传教士可谓是坦桑尼亚现代教育事业的

① Paul White, *The Doctor of Tanganyika*, London: Paternoster, 1952, p. 60.

② Gregory H. Maddox, “The Church & Cigogo: Father Stephen Mlundi &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Tanzania”, in Thomas Spear & Isaria N. Kimambo (eds.), *East African Expressions of Christianity*,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8.

③ Paul White, *The Doctor of Tanganyika*, London: Paternoster, 1952, p. 186.

拓荒者。从 19 世纪初期直到坦桑尼亚宣告独立^①前夕，基督教五大传教组织几乎垄断了坦桑尼亚所有学校的办学工作。顺势而为，就连德英殖民政府后来新建的大多数学校也成为原有教会学校的附属。^②以尤戈戈（Ugogo）地区为例，中小学都隶属于英国圣公会，譬如在非洲赫赫有名的联合中学（Alliance Secondary）。^③因为教会和圣经的影响范围覆盖了中小学和大学，坦桑尼亚大多数政党领导人都上过教会学校。例如，约哈纳·马莱塞拉（Yohana Malecela）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名传教士，凭借其在政坛的影响力和教会的教育背景，他的家族后代在尤戈戈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政府中任重要职位。^④

全国范围内的教会学校培养出了几代优秀的政治领导人，以坦桑尼亚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为代表，他们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圣经的“读者”。这些圣经“读者”反对殖民主义，但并不因此对圣经全盘否定或弃之不用。相反，他们努力“阅读”圣经，运用圣经及自己对圣经的解读作为追求国家独立的工具，尝试从西方传教士的规训中挣脱出来，揭露和批评为殖民行径编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也被称作是对圣经的“政治解放”式解读。在此之后，圣经被大范围地列入各类反殖民演讲、宣言、政治策略的参考范围。^⑤

运用圣经颠覆和消解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圣经诠释方面的中心话语权，推动了圣经解读从教会的传统解读中脱离出来。“阅读基督教”带有明显政治解放标签的释经范式，增强了“读者”分享和接管圣经阐释权的自信心，降低了殖民者的权威性；帮助“读者”对殖民政府无视的某些社会政治问题，比如贫穷、饥饿和疾病等提出审视与质疑。在风起云涌的独立斗争中，对圣经进行重新解读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些早期政治解放式的圣经解读，与随后在普通“读者”中兴起的精神解读相结合，成为奠定坦桑尼亚圣经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基础。

① 坦噶尼喀于 1961 年 12 月 9 日宣布独立，桑给巴尔在 1964 年 1 月 12 日成立人民共和国。为防止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渗透、侵略和颠覆，维护国家独立，1964 年 4 月 26 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10 月 29 日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朱利叶斯·尼雷尔成为首任总统。

② A. P. K. Mushi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anzania*,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6.

③ F. Ludwig *Church and State in Tanzania: Aspect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1961–1994*, Leiden: Brill 1999, p. 30.

④ 约哈纳·马莱塞拉的孙子约翰·约哈纳·马莱塞拉（John Yohana Malecela）曾任坦桑尼亚总理（任期为 1990 年至 1994 年），约翰的弟弟约伯·卢辛德（Job Lusinde）曾任坦桑尼亚驻英国大使。

⑤ 在坦桑尼亚，圣经“读者”不仅仅是基督徒，还包括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仰的群众。see John Chesworth *Muslim Affirmation through Refutation: A Tanzanian Exampl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99, pp. 33–46.

对圣经的“精神体认”

20 世纪中期，在“阅读基督教”的基础上，伴随着轰轰烈烈的东非复兴运动^①，一股沉潜已久的灵性追求喷涌而出，为坦桑尼亚的圣经解读注入了新的活力。普通“读者”中渐而兴起一种精神解读，这种解读侧重“roho”（斯瓦希里语中为“精神”之意），强调向内的体验认识、灵性想象、公开忏悔等，坦桑尼亚的圣经解读史由此别开新境。

（一）罪感与忏悔

随着对圣经阅读和理解的深入，坦桑尼亚“读者”对圣经解读的理念也在继承中发展到了第二阶段。他们认为“罪”是一切悲剧和痛苦的真正根源，“精神纯洁”是喜乐与和平的来源，所以回归圣经推崇的纯洁状态、寻求精神上的“新生”和“转变”尤为重要。^② 在 20 世纪中期的坦桑尼亚基督徒看来，在体悟“罪”之彻心透骨的痛苦和“悔”后光辉澄明的极乐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是一首交织着深重罪孽和圣洁希望的微妙变奏曲，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更暗示出他们对于改造出一个理想世界的热切向往。在当时的坦桑尼亚教堂和学校，信徒们选择在众人面前作公开忏悔。^③

为何这一阶段的圣经解读诉求的侧重点在精神和灵性？首先，重新梳理历史脉络，便会发现 20 世纪中期坦桑尼亚社会经受着各种张力的冲击，包括当时如火如荼的东非复兴运动。从阅读分析到精神体悟，是一种为应对动乱时局而发的“行动中的冥思”。坦桑尼亚基督徒通过他们自己的文化视角对圣经中的“罪”与“忏悔”进行诠释。各种不幸、干旱、瘟疫或者流行病都被认为是神灵（Mulungu 或 Milungu）给予世人的惩罚。故而，公开忏悔“罪行”成为恢复喜乐与和谐的必须，也记载了教徒们绝望与希望、罪感与救恩的心路历程。

其次，宗教市场论的核心观点强调宗教犹如商品，必须满足信仰者的需求，否则宗教也就失去了价值，必然被抛弃。在“阅读”时期，教会学校教授的是

① 东非复兴运动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东非新教福音主义的一场重要运动，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传播到乌干达保护国（英属乌干达）、坦噶尼喀领地和肯尼亚殖民地。这场运动深刻影响了中东部非洲的基督教表达，促进了 20 世纪 40—70 年代东非基督教会的显著发展。

② W. B. And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East Africa 1840 - 1974*, Dodoma: Central Tanganyika Press, 1977, p. 118.

③ Elisabeth Knox, *Signal on the Mountain: The Gospel in Africa's Upland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Canberra: Acorn Press, 1991, p. 119.

一种全新的甚至是异质的信仰和崇拜方式，赞美诗和祈祷书也是根据欧洲文本逐字翻译而来，很少参考涉及非洲本土的宗教范围，对魔鬼进攻和恶灵上身等本土特有的元素持漠然心态。殖民主义解经家更是将各种本土化的圣经诠释统统贴上“曲解圣书、亵渎神意”的标签。^① 之前“阅读基督教”诠释范式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坦桑尼亚基督徒渴望追求更深层的东西。一方面，“阅读”时期的圣经解读为“精神体认”奠定了坚实基础；^② 另一方面，圣经的“精神体认”可以说是由“阅读”产生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衍生结果。

坦桑尼亚圣经解读的“精神范式”于二战后兴起，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东非复兴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以“非洲葛培理”^③——主教费斯托·基文基尔 (Festo Kivengere)^④ 为代表的圣经“读者”领导之下熠熠生辉。^⑤ 虽然东非复兴运动遭到西方殖民统治的镇压，但是依然推动着社会不同群体的互动和博弈，为“精神基督教”的发展注入动力。历史学家、神学家、社会学家等将其视为殖民晚期和独立初期东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费斯托等运动领袖深度体验新精神解读中的忏悔和救赎等概念，并从中反思现实。在坦桑尼亚，所有这些“精神体认者”被称为“精神兄弟” (Ndugu wa KiRoho)，简称为“兄弟” (wangugu 或 brethren)^⑥ 或“复兴信仰者” (wanauamsho)^⑦。对圣经的“精神体认”不仅反映了非洲本土解读模式的复兴，也是坦桑尼亚基督徒与基督教经典的更进一步接触，以及直面坦桑尼亚遗留问题与需求的另一尝试。

(二) 圣经与复兴

从历史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来看，精神基督徒增加了一种崭新的圣经解读与领

- ① 梁工：《殖民/后殖民圣经读者的多样化阅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6 页。
- ② W. B. And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East Africa 1840 - 1974* p. 118.
- ③ 葛培理牧师 (William Franklin Graham, 1918—2018)，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自杜鲁门总统以来 11 位美国总统的属灵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
- ④ 费斯托·基文基尔 (Festo Kivengere, 1919—1998)，被誉为“非洲的葛培理牧师”，在乌干达西南部的基督教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经公开反对“非洲现代史上最残忍的三大暴君”之一的伊迪·阿明。
- ⑤ Marjory Stanway, *Alfred Stanway: the Recollections of a "little m"*, Canberra: Acorn Press, 1991 p. 81. 同期具有代表性的领袖还有乔·丘奇 (Joe Church, 1899—1989)、威廉·纳格达 (William Nagenda, 1912—1973)，他们和费斯托·基文基尔一样为东非复兴运动思潮的传播贡献不菲。
- ⑥ M. Fischer, "The Spirit Helps Us in Our Weakness: Charismatization of Worldwide Christianity and the Quest for an Appropriate Pneumatology with Focus on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Tanzania," *Journal of Pentecostal Theology*, Vol. 20, No. 1 2011 pp. 95 - 121.
- ⑦ F. Ludwig, *Church and State in Tanzania: Aspect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1961 - 1994*, p. 181.

会方式，而且这一方式的能量和权威不再仅仅来源于传教士。^①“精神基督徒”一词意味着“精神引领的基督徒”，因为属于复兴精神“团契”（kiroho）组织，只有在精神皈依后进行公开忏悔方能加入。^②精神团契组织的成员被称为“精神兄弟或精神基督徒”（Wandugu Wakiroho）。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故而被称作“精神基督教”，其标志性特点包括激情澎湃的祷祝方式，还有对于上帝存在和上帝力量进行体验的渴望。^③他们在实践中塑造适合自身的宗教活动方式，将说书、歌曲释经、情绪高昂的朝拜、方言和占卜预言等非洲传统重新引入宗教活动。类似的团契组织也在小学、中学、高等院校里逐渐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的一大特色是安排教徒进行清晨早祷、深夜晚祷或彻夜祷告，以劝诫、教育非洲年轻基督徒抵挡住现代社会的不良诱惑，复兴朴实美好的非洲。^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对圣经的“精神体认”在人群中渗透传播，传至坦桑尼亚各地，基督教复兴派团契也成为跨族群、跨教派和跨行业的组织。而后逐渐出现在坦桑尼亚和东非地区的圣公会、路德会、摩拉维亚教会甚至是天主教会当中。非洲史学家卡兰贾（Karanja）曾评论东非复兴运动应归功于非洲人民对于圣经的创造性运用。^⑤

综上所述，在精神解读阶段，圣经被信徒视为一本有生命的书，并带着个人的特殊印记。与圣经接触，不可或缺的就是精神的体会与认知。然而，精神解读并不能够回答政治、贫困、疾病和教育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普通“读者”需要看到更多精神解读所能揭示之外的东西，包含政治权利体系之间的博弈。质言之，他们在教会学校和教堂阅读圣经，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更是为了重新赢取自由和尊严。基督教信仰和对圣经的解读成为政治上或社会上晋升的必由之路。或隐或明，圣经对于坦桑尼亚政治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普通“读者”开始在圣经的框架下尝试突破，以期探索评判和颠覆殖民主义的可行之法。

① W. B. Anderso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East Africa 1840 – 1974* p. 125.

② See Mote Paulo Magomba *Early Engagements with the Bible among the Gogo People of Tanzania: Historical and Hermeneutical Study of Ordinary “Readers” Transactions with the Bibl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waZulu – Natal 2004.

③ Jason Bruner, “Keswick and the East African Revival: An Historiographical Reappraisal”, *Religion Compass* Vol. 5 No. 9 2011 pp. 477 – 489.

④ J. N. K. Mugambi, “Evangelistic and Charismatic Initiatives in Post – colonial Africa”, in Mika Vahakangas & Andrew Kyomo (eds.) *Charismatic Renewal in Africa: A Challenge for African Christianity*, Nairobi: Acton, 1999 pp. 111 – 144.

⑤ J. A. Karanja *Founding an African Faith: Kikuyu Anglican Christianity, 1900 – 1945*, Nairobi: Uzima Press, 1999 p. 216.

对圣经的乌贾马解读

坦桑尼亚的乌贾马 (Ujamaa) 运动曾被认为是非洲式社会主义的典范, 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是不可否认其对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乌贾马在斯瓦希里语里是指“共同生活、集体劳动和共享劳动成果的传统氏族家庭”。将乌贾马政治理念置于神学背景下进行研究, 国外学界已有不少成果, 本文仅针对圣经如何影响乌贾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作简要探析。

(一) 尼雷尔与圣经

1962 年,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发表《乌贾马》一文, 首次提出开展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乌贾马这一理念主张以非洲传统的村社为基础, 强调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总体目标是消灭剥削、贫困、疾病、愚昧, 实现人人平等。

简言之, 乌贾马所施行的政策都将重心放在“人”上。正如 1967 年通过的《阿鲁沙宣言》所述, “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目标都是为了人民——也就是公民——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财富的创造, 自然是一件好事情, 也正是我们需要力求增加的。但是, 如果财富不再是为人民服务, 便不再是一件好事。”

①尼雷尔认为, 无论肤色、种族、性别, 人人生而平等, 皆享有被尊重的权利。这与圣经“人皆以上帝形象而受造而平等”的观点主旨一致。②

类似地,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论, 它追求的是马克思所谓每个人的充分发展, 谋求的是整个人类的个性解放。③ 当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独尊的硝烟弥漫在那些沦为西方宗主国殖民地的弱小国家中, 本土圣经学者须在重压之下与濒临失语的状态作斗争。后殖民主义圣经批评④力求让被殖民者能够以主体

① Julius Kambarage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16.

② 姜玉峰 《试论尼雷尔的民族建构思想与实践》, 《黑龙江史志》2008 年第 16 期, 第 83 页。

③ 姜飞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10 页。

④ 1991 年苏吉萨拉迦 (R. S. Sugirtharajah) 的著作《来自边缘的声音: 第三世界圣经诠释》出版后, 后殖民圣经批评开始成为圣经研究学界的热议话题。学界普遍认可后殖民主义视角是圣经批评中最为有效、最具启发性、最有解放意义的一种模式。苏吉萨拉迦将第三世界的圣经阐释分成“解放聚焦”和“文化敏感性”两种类型, 前者是指这批研究者特别关注圣经中涉及反抗和解放的主题, 热衷于联系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经历对圣经做出诠释, 后者则指他们敏感于维护弱小民族的文化传统, 注重发掘本土文化资源, 对圣经予以处境化的阅读。参见梁工 《后殖民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 前引文。

地位站在学术话语的舞台上，独立地发出他们的声音，质疑昔日占主导地位宗主国话语霸权，谋求东西方文化平等。

以尼雷尔为代表的爱国忧民社会主义者，不接受帝国主义和殖民化，也反对宗主国破坏他们的固有文化、践踏民族尊严，这种以人为本的目标与每个人的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殊途同归，乌贾马社会主义旨在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人民团结一致，平等地分享社会资源。每一位公民都被鼓励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这也是每个人的权利。尼雷尔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剥削，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参加劳动，每个劳动者都应得到他应得的报酬，而且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不能太悬殊。”^①

尼雷尔认为，只要恢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村社制度，就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这种着重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致力于追求平等、自由的道德价值目标，一方面暴露了乌贾马社会运动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来抓，另一方面也为乌贾马与渗透着“人人平等且有上帝赋予的理性，皆可探索真理之内涵”的圣经后殖民阅读思想相容共通提供了佐证。

通过视察历史细节，不难发现乌贾马实际上从圣经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首先，作为乌贾马之父的尼雷尔，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教育环境之下成长起来。他从小接受了基督教洗礼，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和“读者”。乌贾马运动就是把从事个体劳动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乌贾马实践有着内在的解放意义，这也是从圣经中汲取而来。乌贾马有关兄弟情谊、平等、发展、正义和持续改善人类生活的思想都与圣经有渊源。

此外，基于对圣经的重视和深化理解的需要，尼雷尔还翻译了四部福音书，将经文的训诫与现实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对于圣经人物、故事、卷籍的引用都从侧面反映了乌贾马实现受到圣经影响。1970年10月16日，尼雷尔在纽约为玛利诺女修会发表会议致辞时再借圣经之言，阐述乌贾马的远大抱负和运作方式。他把与贫困、愚昧和疾病作斗争视为赢取“丰盛生命”的必由之道，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教会不仅不可缺席，还需要与全体人民并肩携手（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② 剖析如何分担对抗贫困，赢取公平、尊严、自由的责任时，尼雷尔借用圣经典故一一充实，重申坦桑尼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承认种族平等、男女平等、信仰平等；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都应得到社会的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权得

① Julius Kambarage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p. 233.

② J. K. Nyerere *Man and Development* 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98.

到他个人的劳动所得。总之，不应忽视圣经因素在尼雷尔乌贾马思想中的存在。^①

（二）乌贾马与政治

乌贾马理论和运动促使坦桑尼亚基督徒开始正视一个新议题，也就是基督徒该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持何种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在乌贾马思想形成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坦桑尼亚社会存在着消极“避世”的风气。^②基督徒们阅读圣经，仿佛与现实生活中的贫穷、疾病、政治、困顿毫无关系。当尼雷尔在坦桑尼亚推行乌贾马社会主义时，一些基督教领袖开始心生畏惧和疑虑，担心将宗教视为精神鸦片的马克思主义会大行其道，继而对基督教的生存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庆幸的是，乌贾马的精神内涵和实施并不与圣经的整体框架相悖——大部分基督教领袖渐而意识到这一点。劳伦特·马格萨（Laurent Magesa）再三肯定乌贾马是与基督教信仰站在同一阵线的理念。他表示，“乌贾马的基本抱负和目标使我们可以确认，至少基督福音的宗旨和乌贾马所追求的主旨并不对立，反而是殊途同归，因此基督徒没有理由不接受乌贾马思想。”^③同时，支持者们也逐渐理解乌贾马是非洲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力争解放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有利于教会接触贫困阶层。

笔者认为，基督教内部对于乌贾马态度的改观和对于新阶段社会政治的参与是自上而下实现的，领导人的观念转变和表率促使分散的改革溪流终于融汇统一，继而在全国范围卷起改革的浪潮。

首先是因生活质朴被誉为“赤脚主教”的克里斯托弗·姆沃莱卡（Christopher Mwoleka），他坚持非洲教会应当实现非洲化，适应乌贾马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他还强调教徒们应该摒弃隔离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思想，基督教的发展与非洲人民的发展息息相关，每一位教徒都要响应时代的召唤，投入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前线。他甚至提出，基督徒必须与乌贾马共进退。就这样，经历了一番关于解放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结合乌贾马式的圣经解读，基督教领导层开始鼓励基督徒投身社会政治工作。

① 非洲宗教学家伊希切伊认为，乌贾马是一种“植根于基督教”，强调“共同分享”且具有“非洲社会特色”的理念和政策。see Elizabeth Isichei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ondon: SPCK, 1995, p. 340.

② Laurent Magesa, “Toward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for Tanzania,” in Edward. Fashole – Luke et al. (eds) *Christianity in Independent Af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01.

③ Ibid. p. 510.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彼时的坦桑尼亚基层，可以发现大多数乌贾马村社的领导都是圣经“读者”，他们善于将圣经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马塔约·穆隆博 (Matayo Muyombo) 是一名圣公会牧师，领导了当地乌贾马村社。他除了在基督教活动场所释经授道，还时常组织举行乡民的政治公开集会。在演讲中，他经常运用圣经深入浅出地引导人们参与乌贾马政治活动。这一策略颇为明智，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圣经人物和故事比较熟悉，此举不仅拉近了普通民众和政治之间的距离，也达到了润物细无声地将乌贾马政治理念传递给人们的效果。^①

身处时代的浪潮中，在教会的感召下，坦桑尼亚基督徒决心不再做消极等待的“旁观者”，开始将各种困苦的抗争视为神圣使命。基督教的“读者”们以圣经为索，以信仰为杖，参与到联结圣经与现实生活的探索中去。

治理危机与宗教回归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不正常的气候以及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坦桑尼亚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危机。^② 国内外形势削弱了人们对世俗民族主义的信心，这种侵蚀导致的治理危机为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创造了新的机会和空间。1986 年坦桑尼亚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依赖于乌贾马社会福利的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加上经济自由化只惠及一个狭窄的阶层，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③ 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多党政治的建立，坦桑尼亚的宗教认同有所增强。当治理危机为“宗教回归”创造了新空间时，这种回归在坦桑尼亚社会主要体现为宗教党派通过参与选举来表达宗教诉求，并在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将一些“抵抗宗教”转变为“革命宗教”。正如罗安达所指出的，“在坦桑尼亚政治中，宗教重新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④ 这场冲突的中心是穆斯林对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提出批评，

① See Mote Paulo Magomba *Early Engagements with the Bible among the Gogo People of Tanzania: Historical and Hermeneutical Study of Ordinary “Readers” Transactions with the Bibl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2004.

② 唐大盾《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版，第 286 页。

③ Paul Kais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Fragile Nation: the Demise of Social Unity in Tanzan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9, No. 2, 1996, pp. 227-237.

④ Nguyen Luandu, “Christianity and Islam: Contending for the Throne on the Tanzanian Mainland,” in Adubayoo Olukoshi and Liisa Laakso (eds.),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 State in Africa*,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1996.

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形式的基督教“霸权控制”。^①

宗教与政治虽属不同的范畴，但两者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反映在坦桑尼亚政府部门与基督徒的密切关系上。^② 特别是在那些基督教会传教历史久远的地区，往往是人口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例如姆贝亚和乞力马扎罗。相反，伊斯兰教则与南方的“灰姑娘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地区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会普遍支持国家世俗主义原则，认为这是坦桑尼亚政治的基石，承认教会享有与国家机构密切接触的权力。基督教的特权地位和掌握的资源使其比伊斯兰教更能影响国家政策，穆斯林在政府关键部门中的代表份额一直不足。^③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经济困难与社会问题交织之下，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逢选易乱”现象对坦桑尼亚独立以来的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④ 此外，甚至出现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些宗教领袖利用圣经或《古兰经》公开批判对方的现象。^⑤ 激进的穆斯林则认为坦桑尼亚政治天然存在反穆斯林偏见，这导致了他们处于受排斥、歧视和处于不利地位。^⑥

在这样的背景下，乌贾马时代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被透过宗教和种族的镜头来看待，从而加剧了国家政教关系紧张。^⑦ 社会群体内部的冲突反映了对宗教歧视的批判和政策回应。一个国家的“善政”议程能促使该国更加包容文化和宗教多样性以及促进两性平等，也能为传统困境提供创造性的新对策。

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面临一系列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复杂政治经济问题。尽管乌贾马在实践中成效不如设想般显著，但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真理漫长过程的一部分，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纲领，在坦桑尼亚实现了有意义的发展。通过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各方面的调整，深化了对国情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自力更生的创举也为非洲大陆其他国家摆脱欠发达危机提供了借鉴。

-
- ① Rwekaza Mukandala, *Justice, Rights and Worship: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 Dar es Salaam: E & D Limited 2006 pp. 395-415.
- ② Jonathan Hearn, "Taking Liberties: Contesting Visions of the Civil Society Project,"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 21, No. 4 2001 pp 339-360.
- ③ Mohabe Nyirabu, "Religion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eligion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gramme* 2009.
- ④ Bruce Heilman, "Religion,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3, No. 4 2002 pp. 691-709.
- ⑤ Rwekaza Mukandala, *Justice, Rights and Worship: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 pp. 189-219.
- ⑥ Ibid. pp. 334-359.
- ⑦ Mohabe Nyirabu, *Religion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eligion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gramme* 2009.

结 语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圣经是一部不同民族长期进行解读和探讨的经典。殖民者“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圣经曾在欧洲殖民扩张中扮演重要角色。坦桑尼亚长期遭受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给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带来沉重打击。社会发展水平低、部族差异广泛存在等因素造成民族融合进程发展缓慢。于是，三个阶段的圣经解读——阅读阐释、精神体认和乌贾马解读应运而生。

圣经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殖民者和反抗者都从圣经中寻找契合需求的章节，并重新进行理解和诠释。面对帝国主义强权，反抗者“利用主人的工具拆毁主人的房子”，追求话语权平等权的“后殖民主义”显然是最有力的理论武器。通过对坦桑尼亚圣经解读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坦桑尼亚圣经解读的阶段性发展及其与政治互动不仅满足了国内各部族人民现实中和心理上的需要，发挥了极大的感召团结作用，也为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增进民族一体化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同民族和个人对圣经进行阐释，必定会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经历背景不同而描绘出不同的色彩和韵味。在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宗教成为加强国家一体化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圣经的解读批评应根植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以对话和平等共享文化生存权为基础，谋求多民族、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

(责任编辑：章 波)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lliance – buil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 but also in general people. Ethnic identity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voting decisions of Kenyan people. The 2010 constitutional reforms reshaped Kenya’ s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and promoted political parties to form a broader multi – ethnic allianc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results based on ethnic identity alone in future elections. However ,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has not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Kenyan politics. How to build a multi – ethnic integrated country is still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hat Kenya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process of nation – building and political reform.

Keywords: Kenya , ethnic identity , ethnic politics , constructivism , party politics

Author: Li Jia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Tanzania in the 20th Century

Liu Yu

Abstract: The Bible was introduced into Tanzania as a Christian classic through western colonial activities. Christianity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eople’ s lives , culture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anzania. The Bible is inextricably bound to colonialism. Both colonists and anti – colonialists would reinterpret and explain the biblical chapters that fit their own needs. The colonists would use the Bible to maintain their colonial rule , while the anti – colonists would use “the master’ s tool to dismantle the master’ s house” , namely using the Bible to overthrow colonial rule and obtain national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anzani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 the 20th century: Soma (reading) , Roho (spirit) and Ujamaa. Through the review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in Tanzania ,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in Tanzania and its political interaction meet the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tribes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inspiring and uniting role , which to certain extent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forming unit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anzania ,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 colonialism , ujamaa

Author: Liu Yu , Lecturer of School of Marxism ,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ulouf Polity in Ancient Lake Chad Region

[France] Augustin F. C. Holl/Translated by Zhang Bo

Abstract: Emergent complexit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per refers to an organizational shift in social formations , from small mobile pastoral groups , and sedentary agricultural villages , that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ly centralized and ranked society. It i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ollowed by speakers of Chadic languages who settled progressively in the Chadian plain in North Central Africa , after the gradual receding of Mid – Holocene Lake Chad.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steps of that evolutionary process through the lens of settlement dynamics , political economy ,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ir connected patterns of exchange from 1900 BCE to 1800 CE. A short review of research on trade i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y shows that the study of long – distance exchange tends to focus on characterization and provenience analyses. As important as these two variables ar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exchange network , they do not provide access to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the receiving societies. Accordingly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omitant changes in site – location , flows , distribution , and consumption of long – distance traded items , pattern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nsification , showing that they were part of interlocked feed – back loops. These deviating or amplifying feed back loops triggered a dynamic that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four successive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 Houlouf region *ca.* 4000 years occupation sequence.

Keywords: emergent complexity , political economy , long – distance trade , Chadic polity , Houlouf

Author: Augustin F. C. Holl ,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